

上海文史資料
選輯

第四十二輯



封面装帧 范一辛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46,000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500

书号 11074·557 定价 (六) 0.70 元

内部发行

编辑说明

本会自一九七八年恢复工作以来,承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积极供稿,并得到出版、印刷、发行部门和广大读者大力支持,先后编辑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二十一辑(总第二十一辑至四十一辑)。值此岁序更新,谨向各有关方面致以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三年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头一年。当前全市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精神鼓舞下,坚决贯彻市人大七届五次会议、市政协五届五次会议的各项决议,为在各条战线上创造新成就、增添新光彩而共同奋斗。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也要在原有基础上大力改革,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开创政协工作的新局面作出贡献。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殷切地希望各界人士继续积极写稿,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以利改进。

为了便利出版发行,从今年第一辑起,我们吸取兄弟省市的经验,将《文史资料选辑》改名为《上海文史资料选辑》,并一律只标总辑数,不再按年分辑,特此说明。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一月

大力组织工业发展，是
 推进城乡生产繁荣，国
 家经济的重要步骤。

潘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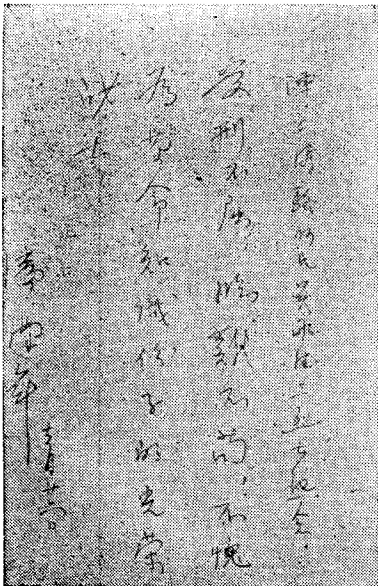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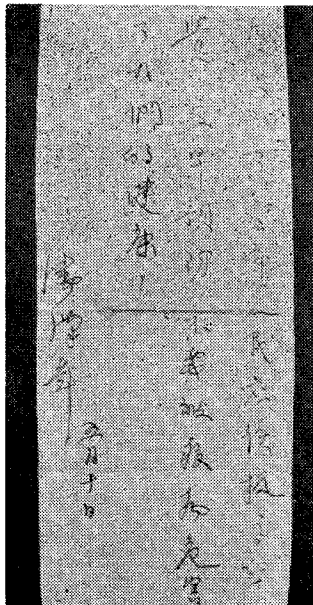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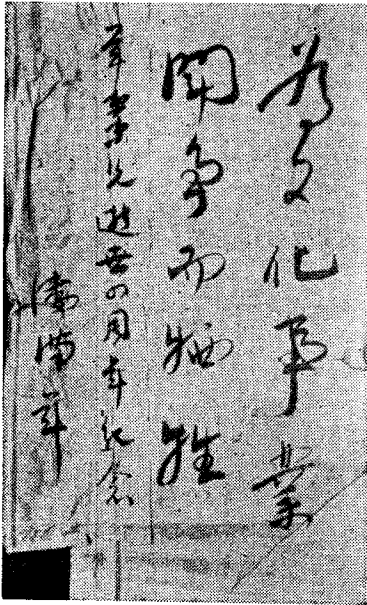
市清一切陈规，敌人
 辈同始末，保障
 生产建设！

潘汉年

二商界在抗美援朝斗争中
 主义运动中，可激爱国志
 气，为发展生产而奋斗！

潘汉年

潘汉年同志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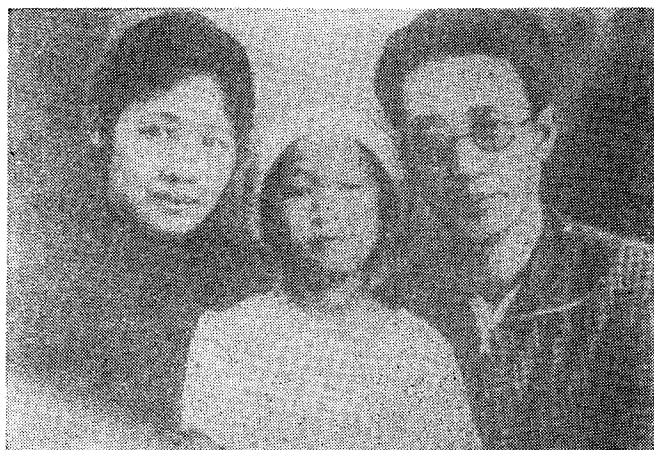
潘汉年同志手迹



一九三四年瞿秋白和
杨之华在上海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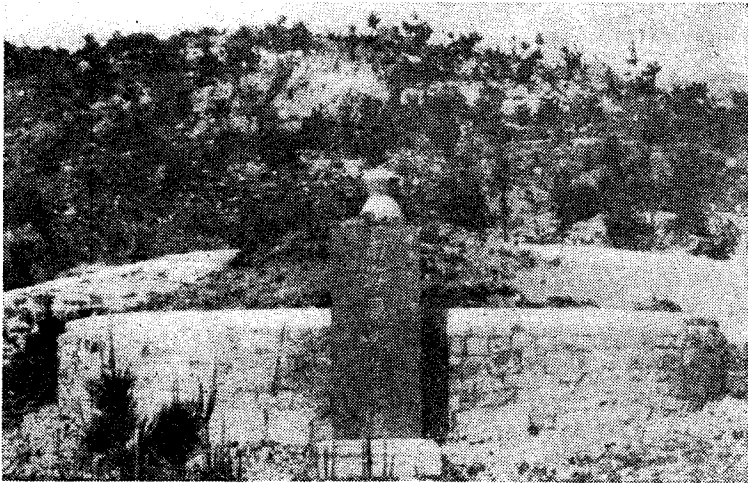
本页照片由
上海市文史
馆杨之英提
供

瞿秋白、杨之华和
他们的女儿独伊





康有为七十寿辰与家属合影



康有为之墓

目 录

回忆潘汉年同志	赵祖康(1)
回忆潘汉年同志二三事	徐雪寒(6)
潘汉年同志对我的教导	郑育之(11)
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同志	袁锬田(17)
怀念三叔汉年同志	潘可西(20)
终南山越狱	靖任秋(25)
我对瞿秋白的一些回忆	郑超麟口述 周永祥整理(42)
大叔秋白生平琐记	瞿重华口述 李凤山整理(53)
回忆东京文化救亡运动	张持平(63)
上海工人地下军始末	周晓华、杨逸等(72)
抗战期间浦东地下军的活动	杨进、杨东林等(84)
康有为的家世和晚年生活	庞 莲(92)
先父刘三收葬邹容遗骸的史迹	刘绣、刘曼君、刘缙、刘虢(108)
辛亥革命时上海南洋公学的学生军	陈梦渔(114)
国民党陆军制度述略(续)	史 说(118)
国民党军队追击红二方面军亲历记	樊崧甫 遗著(134)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空军	王 倬(147)

上海市参议会内幕	潘介眉(163)
陆礼华与中国女子体育运动	吴志明、吕 权、吴 健(172)
明复图书馆始末	郭学群、贾肇晋、徐 英(180)
上海的民族音乐团体	许光毅(185)
施伯安与新通贸易公司	袁丕烈(192)
中国缝纫机厂的兴衰	葛纪元(199)
关于钱鸿业、郁华被暗杀的补正	张 劭(207)

回忆潘汉年同志

赵 祖 康

上海解放后不久，潘汉年同志即担任副市长，协助陈毅市长处理市府事务，因而我与潘汉年同志接触较多。在那五、六年期间，我个人和原工务局干部对潘汉年同志留有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每次听到他在大会上的讲话，深入浅出，处处体现党的政策，使大家很受感动。不少同志说：潘副市长的报告，句句讲到我们心里。嗣后，“潘、杨事件”传开，大家感到十分突然，但限于当时的特殊情况，不敢公开议论，我自己对此在思想上也有个曲折过程。现在潘汉年同志二十七年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大家心情激动，深深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英明正确，不断地增强了党的威信，和党外人士对党的热忱拥护。现回忆我和潘汉年同志种种接触中的片段，借志怀念。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陈毅司令员兼上海市长到市府大楼接管，潘汉年同志也参加。在举行大会后，陈毅同志和我谈话，潘汉年同志和旧市府局长级人员谈话。潘汉年同志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温文尔雅，是党内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好领导。以后，我几次向他报告、请示工作，总感到他非常诚恳，平易近人。过去我长期处于国民党官场中，所接触的大小官僚不是盛气凌人，就是虚伪敷衍，现在从他身上看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良好作风，使我受到

很大教育。

一九四九年七月初，我准备赴京参加全国科技大会筹备会议，在看望陈毅市长之前，看望了潘汉年和周林同志，谈到赴京期间工务局重要人员的人事安排问题。七月底，我由北京回上海，再度去看潘、周两同志，商谈了工务局组织机构与人事安排问题，他们都认真听取了我的意见。这年六月初，我曾两次向潘汉年同志谈到，原上海市警察局代局长陆大公等，在上海解放前夕做了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建议安排他们工作，潘汉年同志表示可以考虑。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和党的统战政策的精神。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人民政府工务局举行成立大会，潘汉年同志代表陈毅市长在会上讲话，对留用人员规勉有加，鼓舞了大家为人民服务的信心和决心。我在他的启发下，在会上表示了三条：一要团结一致，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二要虚心学习，手脑并用，把本职工作做好；三要自力更生建设新上海。通过这次大会，原工务局人员群情振奋，为此后积极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潘汉年同志对我的鼓励很多。有次曾亲切地对我说：你除了做好工务局的岗位工作外，也可以参加上海科技界的活动。就在当天下午，上海科代会筹备会成立，我被选为常务委员。我深深感到他的工作作风细致深入，循循善诱，使我受到很大感动。

一九四九年九月底，我在市科代会上听了潘汉年同志的长篇报告，内容是谈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与科技工作的关系。这是我初次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受益不浅。

不久，人民政府为了打击某些扰乱金融市场的不法商人，采取了种种措施。曾山、潘汉年两位副市长分别到各局处传达关于照顾旧人员生活，发给维持费，以及处理旧人员的若干原则。潘汉年

同志还向我谈了上海市的财政情况和如何做好安定工作。他那种推心置腹的诚恳态度，至今印象尤深。

一九四九年秋，军管会把原工务局的部分职员集中到离职人员学习班学习。这些人接到离职学习通知后，情绪波动，认为共产党对原国民党机关人员是采取包下来政策，怎么现在要离职？是不是“一脚踢开”，讲话不算数？当时我认为这样办有困难，向潘汉年同志谈了。此后，在学习班开办的第一天，潘汉年同志代表市人民政府到会讲话，大意是：工务局在移交时比较完整，人员基本上留下来了，说明你们是靠拢党的。你们中不少人有一技之长，可以为人民服务，要服务好，一定要懂得党的政策，改造旧思想，才能适应新形势，这是参加学习的目的。要你们学习，不是抛弃你们，而是培养你们好好为人民服务。他又说：现在一般人对国民党时的一些局称为“伪××局”，我看工务局不同，就叫“原工务局”吧。说得大家都笑了。会后大家纷纷反映，原来参加学习班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工作。因此，大家情绪一下子稳定下来，参加学习也积极认真了。

一九五〇年二月反轰炸、反封锁运动中，潘汉年同志在一次大会上讲话，为了疏散人口，动员大家支援外地，我当即表示拥护，也愿意去外地工作。他慰勉我说：你对上海城建情况熟悉，还是继续在上海工作好。后来，工务局陆续动员了一些人去外地如青海等地工作，还动员一些技术人员赴朝鲜前线参加抗美援朝。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后，上海开展了镇反运动。一九五一年四月廿九日，我参加了市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公审反革命分子。记得潘汉年同志在大会上宣布判处反革命罪犯封企曾、陈小毛等九名死刑，立即把这批罪犯押赴刑场执行枪

决。当时我意识到潘汉年同志对镇反的立场很鲜明，态度很坚决，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时，在市府机关中进行了内部镇反动员，工务局人员中，有一部分留用人员对党的政策还不了解，心怀疑惧，个别的甚至听了动员报告后，搬了铺盖，准备坐牢。潘汉年同志了解到这些情况，在一次大会上讲了一段话，大意是：大家过去有历史问题，只要如实交代清楚，不能作为反革命，不要人人自危。如果大家都惶惶不可终日，那只能是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有利，使亲者痛，仇者快。这番讲话体现了党的政策，使大家安定下来，投入运动，并继续做好岗位工作。

一九五一年间，党为帮助民革发展组织，在工务局开始成立民革支部时，由三位中共党员、三位青年团员汪季琦、王泽华、赵成宪等和我共七个人负责筹备，发展了一批成员后，正式成立支部。潘汉年同志很关心此事，由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刘人寿同志到会讲了话。在确定我筹建民革支部之前，有人来动员我参加九三学社，我向潘汉年同志请示，他和中共市委一些同志考虑后，向我指出仍以参加民革比较合适。后来我也认识到，这对我的改造与服务确好处。

潘汉年同志在负责市政协工作时，曾作过一次关于统战工作的报告，既生动又深刻，我很受感动。后来，在市府及各局分别成立了统战小组，过组织生活，进行学习和发扬民主。记得在市府的一个小组里，有盛丕华和我及申葆文等。大约开过两次会，刘季平同志出席，听取了非党同志的意见，还讲了话。这对我们认识统战政策的意义和接受形势教育、政策教育很有帮助，有利于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

有一次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党代表大会。会前，潘汉年同志告诉我，邀请我作为党外人士列席大会。在这次会上，使我有机会听了领导同志的重要报告，还组织我们列席人员分组讨论。在讨论中有人表示要申请入党，我表示还得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不够格的话，可以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

一九五一年十月，我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很关心潘汉年同志，问我：“潘汉年同志没有来，工作很忙吧？”我说：“是的。”我对这件事，至今印象极深。

一九五四年起，本市建造中苏友好大厦，由潘汉年同志主持，还成立了一个建筑委员会，由李干成、贺敏学、李广和我参加。技术设计由苏方派了两位建筑师、一位结构工程师主持，我方则由陈植、徐以枋等配合协助。一九五五年春大厦建成，潘汉年同志会同苏联专家举行落成庆祝典礼。接着，我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邀集上海代表，谈了所谓发现潘汉年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证”，大家听了都很惊讶，默不作声。

以上回忆，仅是一些片段。潘汉年同志在我的印象中是党的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既精干，又谦和，在市政府、市政协是很受党外人士敬爱的人。现在，沉冤昭雪，我的心情既激动又振奋。今后一定要在民革工作中，帮助党做好落实知识分子、起义投诚人员、去台人员家属政策的工作，调动更多的积极因素，为四化和统一祖国作出贡献。

一九八二年十月

回忆潘汉年同志二三事

徐 雪 寒

潘汉年同志逝世已经六年，比他年轻的他的爱人董慧同志逝世也四年了。他们都是在不正常的条件下离开人世的，但他们有幸在活着的时候，亲眼看到林彪、江青、康生之流，被全国人民所唾弃，被置于历史的审判台下。汉年很有政治远见，遥想他那时已经深信自己的冤狱一定会得到平反。可是二十多年牢房里冷酷、阴暗的折磨，严重地摧残了他们的身体，以致过早地离开他们所热爱的人间生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终于在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正式为汉年同志彻底平反，并对他的革命的一生作了恰如其分的高度评价。我相信汉年若地下有知，也会得到安慰，受到鼓舞。

对汉年，我是心折已久的，但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后才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冯玉祥将军被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线的战事，他通过王昆仑同志，要求沈钧儒先生在全国各界救国会内选派干部去帮助他建立政治工作。由于我曾长期在全救会工作，所以党派我去执行这个任务。临行前，汉年约我在钱俊瑞同志家里谈话，教导我在工作上应当注意哪些方面。我问到如何同组织保持联系时，他分析了

蒋冯之间的关系，说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对冯有此任命，无非想利用盘踞山东的韩复榘是他的旧部，便于解决韩复榘对抗战的暧昧态度。汉年估计冯很难达到目的，难安于位，所以他决定我的关系还是保存在俊瑞那里。并说，只要冯能站住了脚，组织一定派人来同我联系。这次谈话就这样简短明确地解决了。果然，我匆匆忙忙赶到河北省桑园镇冯的司令长官部后，正和李紫翔同志等打算筹组政治部，不久就撤到济南，又辗转到平汉路待命，接着冯玉祥就被明令撤回南京。我回到南京后，根据钱俊瑞的通知，又去另行执行党分配的任务。这时，我才体会到，汉年对蒋介石及其内部矛盾百出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决定问题这么恰当。

在这以后，我和汉年一直没有什么联系。直到一九四三年我到位于苏皖边区盱眙县境内的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时，才重新遇见他。原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党中央考虑到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等同志的安全，命令他们撤退到苏皖边区的淮南根据地。军部、华中局迁来后，刘晓、刘长胜和潘汉年分别担任过城市工作部、联络部部长。一天，汉年突然把我找去，告诉我，周恩来同志已有电报，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华中局，华中局已经决定把我分配到联络部工作。我聆听之下，大出意外，因为我从来不曾接触过这类工作，自知绝少随机应变的本领。他看我态度犹豫，就给我做思想工作。当时，党内的风气，对党的工作分配是不讲什么价钱的，我也就同意了。

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冬他奉命去延安参加“七大”为止，在这一年多期间，汉年不曾离开过根据地。他多次委派我去南京接关系，并同他在上海领导的单位的几位负责同志接洽工作。大约每二十天左右，交通员去上海取回资料，由我负责审阅，经过分

析、研究、提炼和归纳后，拟成若干份报中央的或通报所属各师的电文，由他审阅后提请华中局领导签发。对于这些，他一般都是认可的。不但对我，对其他两位同志，都不以部属相待，可以说对下级是宽厚的同志式的态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所采取的公正态度。

当时有位同志奉命作汪伪政府中东北军人的工作。这时（约一九四四年夏）汉年在上海领导的单位发现这位同志的生活很不正常，平时举止失措，对党交给的任务执行不力，担心他会被敌人所欺骗，要求汉年及时作出决定。汉年对我说，这位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培养教育出来的，过去工作不差，决不致投敌叛变，但如果组织上不及时给予帮助，也许会被敌人欺骗而上当。汉年要我趁巡视上海单位之便，设法把这位同志动员进根据地，以解除上海组织的后顾之忧。我知道这个任务是相当重要的，但相信汉年有知人之明，相信自己有办法说服他服从组织决定，所以就一口同意了。到了上海处理完了组织内部事务后，我便单枪匹马找到了他，看到他确实憔悴落拓，精神不振。我告诉他，汉年和另一位老同志如何关心他，希望他进根据地学习。我的话并不多，但态度直率，完全信任他。这位关东大汉非常爽快，一口答应，别妻离子，就跟我上了路。我把他交给了汉年，他跟这位同志细细谈了两天，便送他去整风班学习了。汉年告诉我，这位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以后这位同志继续为党做了有益的工作。汉年能够亲自调查处理干部问题，耐心帮助干部提高思想认识，把他们和党的关系重新端正，这就鼓励了干部或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奋发图强和为党工作的信心。汉年之所以能用很少量的干部，驰骋在敌人的心脏里，为党作出重大贡献，其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真诚地对待同